

1989

中国投资报告

CHINA INVESTMENT REPORT

国家计划委员会投资研究所 编
国家统计局 投资统计司

中国计划出版社

1 9 8 9

中 国 投 资 报 告

国家计划委员会投资研究所
国家统计局投资统计司 编

中国计划出版社

1989·北京

1989中国投资报告

国家计划委员会投资研究所 编
国家统计局投资统计司



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月坛北小街2号)
北京商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16 12.25印张 288千字

1989年10月第一版 198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80058—096—2/F·56

定价：6.00 元

(内部发行)

主编 林森木 卢安祖 田江海

编审 华 荣 沈志群 吕有仙

编辑 吴兴国 王 昕

撰稿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五英 王元京 韦 晶 刘 钧 吕有仙 华 荣 孙永红
孙国华 沈志群 宋光蓉 邱全宁 李万茂 李文顺 怀鹏飞
罗云毅 郭世坤 郎锡文 贾 少 耿春普 程 选 靳新中
瞿应龙

资料整理 (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 惠 王 伟 刘立峰 刘惠敏 邢 凯 岳国强 姜 明
钱静子 戚未艾 黄享华 彭继民

致 读 者

当你翻开本报告时，社会主义新中国已经走过了40年的光辉历程，即将迈入本世纪最后10年，向伟大的二十一世纪进军。新中国40年的经济发展史，特别是近10年的改革开放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建设史。在中国的投资史册上，记载了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了失误的教训。认真地、及时地思考一下过去，思考一下未来，对推动中国投资事业持续、稳定、高效益地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投资是固定资产的积累过程。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固定资产积累既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又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中国经济的落后，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实质上就是固定资产积累不足和积累效果低下的结果。但是，投资规模过大，投资结构失衡，投资效益低下，不仅会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而且会削弱经济发展的后劲。因此，如何保持适当的投资规模、合理的投资结构和较高的投资效益，始终是困扰着中国投资增长过程的几个关键性问题。本报告试图透过1988年的视角，纵观改革十年的中国投资增长过程，以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效益和投资体制为主线，全面展示中国投资领域的现状，尤其是对各部门、各级政府、建设单位、设计、工程咨询、施工等各类企业普遍关心的投资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尽可能完整地提供背景资料，作出实证分析，提出对策建议。因此，本报告的宗旨是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投资决策依据，为各类投资主体全面了解全国投资形势，进行项目决策提供信息服务，为有关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开展理论研究和教学提供参考。

本报告作为年度政策性综合报告，以后每年将定期出版发行。由于投资领域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存在问题非常复杂，不可能在一个年度报告中包揽无余，只能在每个年度报告中有重点地阐述。

本报告由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投资统计司合编。在印出本书之前，承蒙《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杂志社的支持，于1989年7月先行将本报告（初稿）付印发表。这次与读者见面的报告，已对初稿进行了大幅度修改，有些章节和附录的全部内容都是新增加的。尽管如此，由于本报告是集体合作的产物，各个章节是在作者独立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在论述的内容上有的力求全面，有的突出重点；在虚实结合上，有的理论分析多一些，有的实际描述多一些；观点也不尽一致；行文上更是风格各异。这一方面使本报告显得“丰富多彩”，另一方面也不能不使本报告的整体性、协调性、规范性受到一定影响。由于受研究能力与写作时间的限制，本报告作为第一次尝试，无论是在选题、资料和内容的深度与广度，还是文字水平，与读者的要求

们向读者表示歉意，并恳切地希望听到大家的宝贵意见。我们有信心把今后的报告编写得更好，为中国投资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不辜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时代。

今年恰逢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建所十周年，谨献上本书以志纪念。

编 者

1989年8月

目 录

内容提要	(1)
第一章 投资总量——仍受膨胀羁绊	(5)
第一节 改革与发展	(5)
1.1 经济体制的全面变化	(5)
1.2 经济面貌的重大变化	(5)
1.3 投资领域的主要变化	(6)
1.4 新形势下的新难题	(7)
第二节 治理与整顿	(7)
2.1 投资增长的概况	(8)
2.2 产生问题的原因	(8)
2.3 缓解矛盾的对策	(9)
第三节 清理与压缩	(9)
3.1 清理压缩投资规模的历史回顾	(10)
3.2 清理压缩投资规模的进展情况	(10)
3.3 清理压缩投资规模的政策建议	(11)
第二章 投资结构——未能矫正失衡	(15)
第一节 投资结构的变动	(15)
1.1 计划内投资与计划外投资	(15)
1.2 生产性投资与非生产性投资	(15)
1.3 重点建设与非重点建设	(16)
1.4 更新改造投资的内涵与外延	(16)
1.5 地区间与单位间的投资比例	(17)
第二节 政策效应的反思	(17)
2.1 投资结构调整是长期复杂的变化过程	(17)
2.2 投资结构调整是艰难的利益调整过程	(18)
2.3 投资结构调整是庞大的系统分析过程	(18)
第三节 失衡表象的背后	(18)
3.1 对结构失衡的第一种解释	(18)

3.2 对结构失衡的第二种解释	(20)
3.3 对结构失衡的第三种解释	(20)
第三章 投资效益——争取走出低谷	(24)
第一节 固定资产投资的综合效益	(24)
1.1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	(24)
1.2 百元投资新增国民收入	(24)
1.3 投资效果系数	(26)
第二节 建设项目的投资效益	(27)
2.1 建设工期	(27)
2.2 项目建成投产率	(27)
2.3 工程造价	(28)
2.4 新增生产能力利用率	(28)
第三节 影响投资效益的直接因素	(29)
3.1 盲目建设与重复建设	(29)
3.2 建设项目小型化	(30)
3.3 未完工程积压资金	(30)
3.4 工程建设“三算两超”	(30)
第四章 投资增长——努力消除通胀	(34)
第一节 投资与货币流通	(34)
1.1 相关性的一般原理	(34)
1.2 投资与货币投放	(35)
1.3 投资与货币回笼	(36)
第二节 投资与通货膨胀	(37)
2.1 投资规模与通货膨胀	(37)
2.2 投资需求与通货膨胀	(38)
第三节 投资效益与滞胀	(39)
3.1 效益的考察	(39)
3.2 滞胀的探讨	(40)
第五章 产业投资——探索发展基点	(44)
第一节 总判断	(44)
1.1 预期与现实	(44)
1.2 初步的解释	(44)
1.3 若干提示	(46)
第二节 农业	(47)
2.1 投资总量与投向	(47)

2.2 投资比例的失常	(51)
2.3 投资需求的不足	(52)
2.4 投资短缺的根因	(53)
2.5 投资增长的出路	(54)
第三节 能源工业	(54)
3.1 得来不易的速度	(54)
3.2 缺口与后劲	(55)
3.3 价值规律与倾斜政策	(56)
第四节 汽车工业	(58)
4.1 显著的特点	(58)
4.2 严重的问题	(60)
4.3 确定的对策	(61)
第五节 交通运输	(61)
5.1 严峻的形势	(61)
5.2 原因的探究	(62)
5.3 相应的对策	(65)
第六节 教育	(65)
6.1 不该忽视的成就	(65)
6.2 教育经费过低吗	(66)
6.3 倒金字塔结构	(68)
6.4 结论与主张	(69)
第六章 地区投资——权益协调维艰	(72)
第一节 工业地域结构的变动	(72)
1.1 区域类型	(72)
1.2 方法说明	(73)
1.3 地区工业结构与投资结构	(73)
第二节 价值判断与原因分析	(79)
2.1 价值判断	(79)
2.2 孰之过	(80)
第三节 资源区典型调查	(81)
3.1 规模的决定	(81)
3.2 结构的变动	(82)
第七章 预算外投资——宏观调控难点	(87)
第一节 投资总量的内在变化	(87)
1.1 预算外投资含义	(87)
1.2 比重变化的分析	(87)

1.3 来源构成的考察	(90)
第二节 投资结构的客观变动	(93)
2.1 不统一的价值判断	(93)
2.2 不均匀的行业分布	(94)
2.3 行业构成曲线的离异	(95)
第三节 投资管理的深层机理	(98)
3.1 调控政策的行政性	(98)
3.2 机制失常的复杂性	(98)
3.3 体制变革的前景	(100)
第八章 证券投资——市场发育艰难	(105)
第一节 长期资金市场的现状	(105)
1.1 发展阶段	(105)
1.2 发行市场	(105)
1.3 交易市场	(106)
1.4 组织管理	(107)
第二节 长期资金市场的特征	(107)
2.1 显著的非对称性	(107)
2.2 强烈的行政干预	(108)
2.3 扩张的资金需求	(108)
2.4 递增的债券利率	(109)
2.5 滞后的交易市场	(109)
第三节 长期资金市场的趋向	(110)
3.1 严峻的经济形势	(110)
3.2 必要的调整措施	(111)
第九章 投资体制——十年改革轨迹	(114)
第一节 投资体制改革的反思	(114)
1.1 三条主线	(114)
1.2 三大成就	(115)
1.3 三大问题	(116)
第二节 拨改贷到基金制的回顾	(117)
2.1 拨改贷的试行与推开	(117)
2.2 围绕拨改贷进行的争论	(118)
2.3 基金制与拨改贷的异同	(120)
2.4 完善基金制的几点设想	(120)
第三节 近期方案的思考	(121)
3.1 方案出台的背景	(121)

3.2 方案的积极意义	(122)
3.3 方案的局限性	(123)
第四节 基建程序的沿革	(124)
4.1 基建程序的传统模式	(124)
4.2 基建程序的不断修改	(125)
4.3 现行基建程序的问题	(127)
4.4 完善基建程序的建议	(127)
第五节 招投标的实施	(129)
5.1 引进竞争机制的重要尝试	(129)
5.2 竞争机制带来的重大变化	(129)
5.3 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30)
第六节 中期规划的思路	(131)
6.1 投资体制改革的目标	(131)
6.2 中期改革规划的主线	(132)
6.3 相关的配套改革	(135)
6.4 中期规划的意义	(135)

概念与观点简介

投资	(13)
年度投资规模与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	(14)
投资需求	(23)
投资产出率与边际投资产出率	(33)
通货膨胀的成因	(42)
总需求与总供给	(43)
经济发展与投资倾斜政策	(71)
比较利益理论	(85)
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	(86)
全社会投资的间接调控	(101)
预算外资金	(104)
投资的利率弹性	(113)
《关于投资管理体制的近期改革方案》摘要	(137)

附录一 1988年投资大事记	(143)
附录二 我国主要投资指标统计表	(154)
附录三 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重点项目综合表	(178)
附录四 1988年有关投资文章要目	(181)
附录五 主编单位简介	(183)

内 容 提 要

第一章 投资总量——仍受膨胀羁绊

1988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走过了第10个年头。

1988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97亿元，如果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投资量的增长幅度略低于上年。截至1988年底，全国决定停缓建各类建设项目14000多个，计划总投资492亿元，扣除已经完成的投资，可压缩今后投资442亿元。

经过清理整顿，1988年四季度的基建投资增长速度相对减慢，但总量仍然过大。表现在：(1)在建项目过多，计划总投资过大；(2)计划执行突破3300亿元的计划要求，实际完成的年度投资超额36.3%；(3)投资率比大膨胀的1985年还高出2.4个百分点。

建国以来，四次大的投资膨胀(1985年以来为第四次)都集中反映了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冒进冲动和倾斜上的偏差。主要标志：(1)投资增长大大快于国民收入增长，积累率突破30%；(2)超计划安排基建投资；(3)投资方向上生产性建设与非生产性建设比例失调，农轻重比例不适当；(4)投资的安排上没有把内含扩大再生产放在重要地位，重新建、轻技改。

为摆脱投资膨胀的羁绊，我国应在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增强宏观指导能力，以法律规范投资者的行为以及建立投资双向风险机制上多下功夫。

第二章 投资结构——未能矫正失衡

1988年，国家在控制投资总量的同时，注意把重点转向调整投资结构。一年来的结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三保三压”等结构调整政策的贯彻，使生产性建设与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比例、重点建设与非重点建设的投资比例趋于协调，更新改造的投资比重上升，投资的地区分布基本体现了加快发展沿海地区经济的战略方针；但另一方面，计划外投资增长迅猛，非生产性投资的内部比例出现失衡，市政设施、文教投资比重降低，楼堂馆所的投资比重居高不下，重点产业中的农业、交通业的投资比重过低的局面仍未改观。投资结构调整政策效应的不平衡性、差异性，反映了调整投资结构过程的复杂性。

为矫正投资结构失衡的偏差，首先要对结构失衡作出解释。本报告认为：(1)导致一般加工工业与基础产业之间的投资比例失衡的原因，在于产业结构中资产存量结构的累积偏差；(2)楼堂馆所投资连年失控的原因应循着城市化这条矛盾主线来探寻；(3)不合理的投资分工构成计划内外投资比例失衡的深层基础。

第三章 投资效益——争取走出低谷

投资效益好坏是投资规模、投资结构合理与否的集中反映。1988年部分投资效益指标有所下降，值得引起高度重视。(1)1950年至1988年，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平均为72%(1988年仅71.1%)，与同时期的苏联相比，低20多个百分点；(2)百元投资新增国民收入近年来

呈下降趋势；（3）1988年投资效果系数为0.69，比1987年（0.77）有明显降低；（4）据典型调查，新建大中型棉纺织厂和糖厂的建设工期有所延长；（5）“七五”前三年，国家重点发展的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固定资产形成率有所下降；（6）“七五”以来，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单位生产能力的造价有较大幅度增加；（7）据对1988年投产的44个项目的统计分析，有一半项目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50%以下，比“七五”头两年又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从我国实际情况分析，直接影响投资效益提高的因素有：（1）盲目建设、重复建设；（2）建设项目小型化；（3）未完工程积压资金；（4）工程建设“三算两超”（预算超概算，决算超预算）。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的因素影响着投资效益的提高，全面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才是走出低效益困境的根本出路。

第四章 投资增长——努力消除通胀

1988年，投资增长受到通货膨胀的严重困扰。一般来说，投资作为需求而作用于通货膨胀，投资通过工资、奖金及其他需要现金支付的项目开支引发货币（ M_0 ）投放。长期看，投资又作为供给起到平抑总需求的作用，投资增长与货币回笼具有正相关关系。

投资增长如果是通过提高积累、压缩消费来实现，因此引致的货币投放的增长属正常增长。现实经济与之相反，消费基金迅速增长造成工资侵蚀利润、消费侵蚀积累，使得投资增长越来越依赖信用的扩张，投资膨胀造成贷款发放过猛。这是导致货币大量投放的更重要环节。

当前经济中，投资的结构分布与货币回笼产生矛盾，基础工业建设工期长，短期内回笼货币效果差；加工工业短期内支撑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是回笼货币的重要因素。回笼货币与调整产业结构的方向相悖。

第五章 产业投资——探索发展基点

投资结构在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极度倾斜，但未能塑造出同向倾斜的产业结构。处于某种非常时期的产业结构的波动，既取决于投资增长及其结构的变化，也取决于投资以外的因素。1984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代价系数接近100，引起严重的经济动荡。由此可见，超越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强行推进高层次产业的现代化，对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来说是不现实的。

“六五”以来，在工农业投资结构的演变中，一方面农业投资内在的抗波动功能弱化，另一方面又缺乏外界对农业投资的保护性措施，因而造成国民经济中工业投资增长的超稳定性和农业投资波动的超常规性，使得我国农业投资在全国投资膨胀的呼声中一步步走向萎缩。由农业投资不足引发农业投资需求不足是我国农业危机的关键所在。

能源工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在能源建设明显加速的同时，整个经济却以更高的速度持续增长。“六五”以来，能源消费量的年增长率高于能源产量的年增长率。我国长期以来保持的能源产品廉价供给的体制客观上形成了一种鼓励消费而压抑生产的机制，重点投资能源的倾斜政策受到能源产品与加工业制成品比价悬殊这一根本性矛盾的抗衡。

我国汽车工业投资的问题是，投资分散化造成重复布点，投资小型化形成规模效益低下，重点投资不足影响工程进度，建材价格猛涨导致物资供应紧张。

我国交通运输业的形势较为严峻，交通运输设施不足，负载沉重，年久失修。造成这种

紧张局面的重要原因在于投资不足，其中交通运输项目建设需要巨额资金、建设工期长、盈利率低、政策制约等又是交通运输业投资增长减速的主要原因。

我国教育发展的困境关键不在于教育投资短绌，而在于教育投资的结构性失误，全民教育结构是“倒金字塔”型。问题的根本在于指导思想上只重视高等教育而忽视基础教育。

第六章 地区投资——权益协调维艰

我国以往的区域分析以及政策的制定，几乎均按东、中、西三大地带来进行分析与构思。本报告则依据各省区产值结构区位商（表示多个研究对象在多区域空间的相对分布状况），把全国划分为资源区、加工区和混沌区三种类型。

通过对1985—1988年各地区、各行业投资区位商与产值区位商的比较，可得出下述结论：（1）混沌区将继续维持原相对均衡的地位，重型加工工业是该类地区的重点投资取向。（2）资源区采掘业、原材料工业区际意义将下降，轻、重加工工业是该类地区的重点投资取向。（3）加工区恰与资源区相反。（4）在投资方向与各自地域分工职能上，加工区与资源区存在着“逆向”运动，预示着1985—1988年投资格局将继续推动地区间产业结构的趋同化。

通过分析，本报告认为，迄今为止全国统一的要素与商品市场远未形成，以资源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地区比较利益仍未成为各地投资者追逐的目标，从而，当资源配置被禁锢在“诸侯”疆域内时，是无法产生由分工带来的那种超越单个区域分力简单相加的强大合力。究其原因，价格体系扭曲了地区比较利益，但并不必然导致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而地方政府“诸侯”式的权益则是使趋同化成为必然的根本条件。

第七章 预算外投资——宏观调控难点

近年来，集体企业、个体经营经济实力增长迅速，全民企业税后留利大大增多，地方机动财力余地扩大，全民自筹资金来源相对丰裕，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迅猛增长，这一系列的因素导致预算外投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预算内投资增长。

在各项资金来源中，贷款投资超计划最多，其次是自筹。自筹投资一般有物资对应，但金融系统则能通过货币发行和“贷转存”自行创造资金来源，因而超过既定限额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极易产生信用过度扩张，超额发放的贷款由于没有物资对应，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通过对预算内外投资的行业分布的考察，本报告认为，预算内投资的行业构成曲线（基准线）体现国家不平衡的产业政策；自筹投资的行业构成曲线与基准线的走向相当接近，大致也体现国家的产业倾斜政策；利用外资和国内贷款的行业构成曲线与基准线的离异度较大，说明与国家产业倾斜政策的联系较弱。

第八章 证券投资——市场发育艰难

10年来，我国证券的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已初具雏型。发行市场主要靠强烈的行政干预加以推动，交易市场则远远滞后于发行市场。证券市场在形成和发展中表现为显著的非对称性——资金需求远远大于资金供给，从而只有需求方的竞争，没有供给方的竞争，资金市场供求双方处于不平等的竞争状态中。

国家建设资金不足靠行政摊派迫使企业购买债券，企业资金不足挤银行，地方银行信贷资金不足挤中央银行，最后不得不扩大货币投放，非对称的资金市场迫使需求方提高利益刺激，债券发行利率居高不下，低盈利的基础产业难以进入长期资金市场。

资金市场面临两难选择：利率调节导致资金使用结构更趋不合理，行政干预又往往扭曲

资金需求方的意愿。1988年的“抢购风”使资金市场的发展受到严峻挑战，人们宁愿购物而不愿购买债券。1988年债券实际发行额只是计划发行额的81.14%。受通货膨胀和紧缩政策的影响，1989年证券发行市场中，对企业而言将遇到“资金短缺”的障碍，对个人而言将遇到“保值储蓄”的障碍。同理，证券交易市场也不太可能出现繁荣的局面。

第九章 投资体制——十年改革轨迹

10年来，投资体制主要在投资资金管理、投资计划管理、投资经营管理三个方面进行了改革。

拨改贷向无偿拨款体制发起挑战，在突破旧观念、用款实施经济约束以及还款纳入预算盘子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体制变动不定，合同管理不严，利率约束不力，贷款豁免不当，致使拨改贷的改革措施成效不大。投资基金制比拨改贷前进了一步，这主要表现为基金具有稳定性、周转性、增长性和风险性；然而，由于基金制与拨改贷制有诸多联系，也不免带有拨改贷制弊端的若干痕迹。

1988年7月的《关于投资管理体制的近期改革方案》在建立基建基金制、成立国家专业投资公司以及划分各类投资主体的投资范围等诸方面，都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但由于改革目标不够明确，致使近期方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我国基建程序几经修改，目前的问题仍很严重，项目决策程序缺乏信息反馈系统，前期工作程序繁琐冗长，未经批准擅自开工的现象十分普遍。招标承包制虽一度活跃了我国建筑业市场，但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建筑市场，行业管理薄弱，法规不健全，改革措施不配套，再加上建筑企业素质不高，经营管理水平低下，致使招标承包制难以继。

投资体制中期改革规划以近期改革方案为基础，改革重点在于转变政府投资职能，完善企业的投资机制，建立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全社会投资宏观调控体系。今后两三年对全社会投资调控的基本政策应是：控制贷款投资，调整收入结构，集中政府投资，引导企业自筹。

第一章 投资总量——仍受膨胀羁绊

第一节 改革与发展

1988年，中国的改革走过了第10个年头。这10年，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史册上，写下了极其重要的一页。为了准确地把握和分析1988年中国投资领域的形势，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中国10年改革与发展的进程。

1.1 经济体制的全面变化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突破。1978年，我国农民创造的承包制翻开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页。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一扫生产上的瞎指挥现象，破除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创造了世界上“不可设想的奇迹”。我国农村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

二、企业经营自主权得以扩大。1984年，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通过简政放权，推行承包租赁的经营责任制，企业在生产计划、产品购销、产品价格、自留资金使用、劳动人事、工资奖金以及自愿协作等方面都增强了自主权，企业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开始具有自主经营的独立意识。

三、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10年改革，所有制结构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成份转变，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有了较快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四、商品市场逐步发展，要素市场开始发育。10年改革，取消了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和工业消费品的统购包销制度。各类产品中由市场定价的比重上升，国家计划控制价的比重下降，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有所扩大。与此同时，开始筹建金融、技术、劳务和房产等要素市场。建立一个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的设想取得初步进展。

五、宏观调控方式有所转变。改革以来，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指令性计划开始减少，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比重相应增加，国家对企业的管理正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向间接控制为主转变，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开始转向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指导性计划的方式。

1.2 经济面貌的重大变化

一、国家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482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138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1979—1987年平均每年增长9.4%，1988年又比1987年增长11.2%，明显高于前26年（1953—1978年）年平均增长6%的速度。国民收入由3010亿元增加到11533

亿元，1979—1987年年均增长9%，1988年又比1987年增长11.4%，明显高于前20年年均增长6%的速度。10年来，建成投产的基本建设项日和更新改造项目各在30万个以上，新增固定资产一万多亿元。国民经济增长的后继力量得以增强。

二、农业生产缓慢发展的局面有所改变。1988年与1978年相比，农业总产值由1397亿元增加到561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1979—1987年年均增长6.5%，其中，粮食增长33%，棉花增长96%，油料增长1.9倍。尽管1988年粮、棉、油都有不同程度的减产，但农业总产值仍比1987年增长3.2%，超过前26年年均增长2.6%的速度。引人注目的是乡镇工业的崛起与大发展，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工业生产再上一层楼。1988年与1978年相比，工业总产值由4237亿元增加到1810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1979—1987年年均增长12%，1988年又比1987年增长20.7%。1982—1987年，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5%，1988年又比1987年提高9.3%。10年来节约能源折合标准煤1.9亿吨。

四、商品市场供应较大幅度增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87年达到5820亿元，比1978年增长2.7倍，实际年均增长15.8%；1988年又达7440亿元，比1987年实际增长7.9%，超过前26年平均每年增长6.1%的速度。产品适销对路，花色品种繁多，商业网点大量增加，集贸市场遍布城乡。

五、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迅速发展。1988年与1978年相比，出口商品总额由97.5亿美元增加到475.4亿美元，增长近4倍；进口商品总额由108.9亿美元增加到552.5亿美元，增长4倍以上。从1979年到1988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473.4亿美元。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得以扩大，将有利于形成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的格局。

六、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从1978年的316元增加到1988年的1119元，增长2倍以上，扣除价格因素，1978—1987年实际增长85.6%，1988年比1987年实际增长1.2%。生活质量明显提高，消费结构有所改善。1987年全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比1978年增加4.3平方米。1978—198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545元，增长了4倍以上。扣除价格因素，1978—1987年年均增长12.1%，1988年又比1987年实际增长6.3%。

1.3 投资领域的主要变化

改革，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导致投资领域发生了以下变化：

一、投资主体多元化。伴随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投资领域开始形成多种经济成份投资并存、多元投资主体并存的新格局。除中央政府投资外，各级地方政府投资、企业投资、个体投资、外资投资发展迅速。

二、投资渠道多元化。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变财政“统收统支”为“分灶吃饭”，投资渠道由国家拨款的单渠道转变为预算内拨款、拨改贷、银行贷款、地方自筹、企业自筹、城乡集体企业筹款、各种方式的集资和利用外资等多渠道。

三、投资决策分权化。简政放权与“投入产出包干”，使得投资决策由过去单一的中央集中决策转化为多层次决策，现有中央决策、部门决策、企业集团决策、全民企业决策、集体企业决策和私人决策等。

四、投资目标多重化。投资主体地位的差异，促使国家投资在实现宏观发展战略目标的同

时，兼顾到投资的经营目标；地方投资在追逐政绩目标的同时，兼顾到社会福利、缓和就业压力的目标；企业投资则在比较利益导向下，在赢利、福利、政绩、就业、竞争能力等多目标中相机抉择。

五、投资方式多样化。多元投资主体的逐渐形成，除了保留自上而下的纵向投资方式外，还开辟了部门间、地区间、企业间的横向投资方式。同时，还出现了一业为主、兼营多样、联合投资方式。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处的股份投资方式。

六、投资领域的这些主要变化具有两重性：其积极意义在于动摇了传统经济体制的支柱——国家高度集中的投资分配和管理制度，为投资领域向商品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消极意义在于由于投资领域的变化与宏观投资调控机制转变的不同步，加大了体制转轨的摩擦。

1.4 新形势下的新难题

一、通货膨胀逐年明显。与上年同期相比，1986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6%，1987年上升7.3%，1988年上升18.5%。明显的通货膨胀已经使一部分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二、消费基金严重膨胀。居民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4年59.9%上升到1988年的62.6%。尤其值得重视的是，1983—1987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1%，而社会集团消费平均每年增长19.7%。社会集团购买的消费品总额，1987年达553亿元（超过当年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总额），1988年达665亿元，比上年增长20.3%。恶性膨胀的社会集团消费大大助长了奢侈浪费之风。

三、投资规模结构性膨胀。1981—1987年，按当年价格计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每年增长22%，1988年又比1987年增长23.5%，大大超过同期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投资规模膨胀主要呈结构性膨胀特点，非生产性项目特别是楼堂馆所上得太多，标准逐年提高；预算外投资向价高利大的加工工业倾斜。1988年，加工工业产值增长23%，而采掘、原材料工业产值仅增长10.8%。投资需求结构不合理，导致在建投资规模过大。

四、货币超经济发行，信贷规模明显膨胀。10年来，累计净投放货币突破1800亿元，到1988年末，市场货币流通量将比1978年末的212亿元增长10倍多，大大超过经济增长幅度；银行贷款收支相抵，存贷差扩大2.7倍。1988年，全年净投放货币679.6亿元，年末货币流通量达到2134亿元，比上年末增长46.7%，存贷差由上年末的2460亿元扩大到3101亿元。货币超经济发行，信贷规模膨胀支撑着通货膨胀、消费基金膨胀和投资规模膨胀。

综上所述，中国10年改革和发展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出现的失误和面临的困难也无须否认。当前需要的是总结经验、分析问题、探索对策，进一步明确和坚定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大目标，这也是分析投资形势，研究投资问题的出发点。

第二节 治理与整顿

1988年，我国的改革与建设事业在继续取得进展的同时，多年积累的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明显加剧，经济生活全面紧张。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